

本土、勇武與犬儒： 傘後香港的社會趨勢

陳 健 民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吳 木 欣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特任導師)

摘 要

2014年9月28日爆發的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捲入超過百萬香港市民，以非暴力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佔領行動持續79天，政府未有確切回應普選訴求，運動內部出現分裂，對運動的目標、手段、組織方式、與政府談判的策略、退場機制等都有不同意見。學生組織最後在激進力量壓力下，即使民氣已盡亦欠缺周詳組織，竟發動升級行動，結果造成多人受傷，佔領最終黯然結束。即使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啟蒙作用，年輕人覺得運動是「無功而還」，甚至是徹底失敗，「傘後」瀰漫著沮喪與挫敗，三種社會趨勢繼而出現。第一是「本土化」，包括本土優先、城邦自治、甚至港獨民族等思潮的湧現。不少青年覺得在「一國兩制」下已無法實現真普選，必須轉而爭取民族自決以至主權獨立。第二種趨勢是「勇武化」，主要是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民主運動策略已經失效，必須採取更激烈的抗爭方式。2016年農曆元旦的「魚蛋革命」(旺角騷亂)，便是典型的勇武抗爭。第三種趨勢是「犬儒化」，主要是瀰漫在中產階級的一種無力感，暫時隱而未發。未來中共是否延續其在2003年後對港的高度介入政策將影響「一國兩制」的前景和這三種趨勢的結局。

關鍵詞：香港、雨傘運動、一國兩制、本土

* * *

壹、前言：中國國家主義與香港自由主義的碰撞

2014年底捲入百萬港人的雨傘運動和2016年初出現的「魚蛋革命」(旺角騷亂)，一方面是港人爭取普選和對特區施政不滿的總爆發，另一方面可以說是伴隨「中

國崛起」而生的「國家主義」與香港長期在經濟及社會領域奉行的「自由主義」劇烈碰撞的後果。

中國自 19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雖然是以「政企分家」為起步，但今天中國政府對經濟領域仍擁有強大的調控力，而現代化理論預測經濟發展帶來的政治轉型，卻遲遲未有出現。即使社會結構已日趨多元、人民權利意識日漸提升，中共以行政改革提升執政能力而不改其專制本質，對傳媒與公民社會嚴加控制，更遑論民主改革。中國的「國家主義」，表現於將愛國提升至近乎宗教層次，將大國崛起塑造為全民奮鬥目標。隨之而來的是鞏固中共的領導，認為只有強大的政府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和公平正義。為了證明集權與發展並行不悖，連納粹德國的理論家 Carl Schmitt 的民族主義及「文化特殊主義」概念都被中國著名新左派學者引用，以證明可以走上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的現代化道路 (Sapio 2015)。自習近平於 2012 年上台以後，這種國家主義更有從「一黨專政」向「個人集權」方向發展，自然為早已矛盾重重的「一國兩制」加添張力。

貳、中共對港事務加強干預與梁振英任內的黃金交叉

中共對港政策在回歸前採取懷柔統戰手段，攏絡華人精英，以「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安撫民衆。回歸初期，中共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以穩定人心，但 2003 年《基本法》23 條 (即國安法) 立法失敗，^①中共判斷香港「人心仍未回歸」，且有外國勢力煽動民衆對抗中共，開始採取更進取的對港政策。中央政府對港事務開始由「高度關注」發展至「以我為主」。通過各級官員的談話，提醒港人「一國先於兩制」，中央政府除了外交和軍事外，對特區擁有多種權力。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不單在香港各級選舉時協調建制力量，更公然就立法會應否運用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向建制派議員發出指示。至 2014 年有關普選特首爭議白熱化的時候，中國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中央政府對港有「全面管治權」，被視為損害高度自治的精神。2016 年「兩會」期間，中央政府官員談到對港政策，提出「嚴依憲法」，有別於以往強調「按基本法辦事」的說法。這些提法與行動都在削弱兩制的重要性而強調一國的超然地位，衝擊高度自治。

無論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實驗或者一種 (五十年) 過渡性安排，「一國兩制」無可避免包含強大的張力。香港經常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而即便沒有民主選舉，在殖民地時期已發展出自由的媒體和活躍的公民社會。自從上世紀 1990 年代後，政黨

註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23 條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詳情參考網路資料〈基本法與你息息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開始發展，立法會亦開放部份直選議席，令香港成爲一個混合型甚或半民主體制。相反，中國在上世紀 1980 年代出現短暫的政治自由化，卻以六四鎮壓結束，其後所見的是「國家主義」的興起，中央政府不單強化其財政調控力，亦對意識形態有更嚴厲的監管。在一國下，兩制在政治上背道而馳卻沒有發生劇烈的碰撞，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是向香港模式靠攏，借助香港金融中心進行融資，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認爲只要「井水不犯河水」，中央政府可「長期利用」香港而無需對其高度自治有太多憂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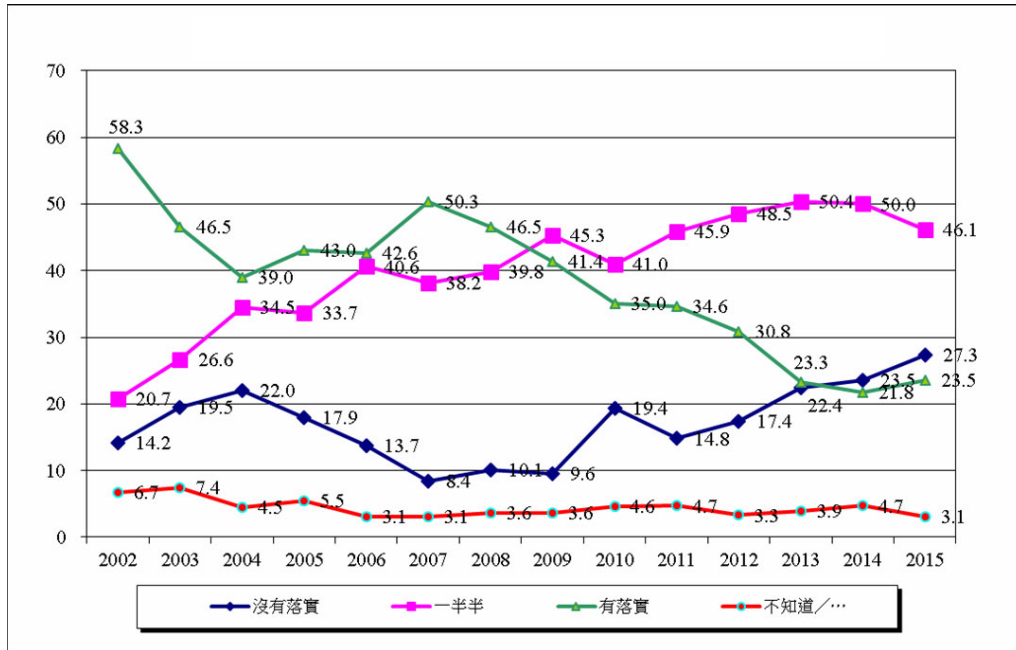
但中國經濟改革成功，成爲全球第 2 大經濟實體，令其日益減少依賴香港，自然影響兩地的權力關係。此外，中共明白到共產主義已失去感召力，轉而以愛國主義作爲支撐政權的意識形態。由於樹立「外敵」是建構民族主義的不二法門，保衛「國家安全」成爲許多部門的重要任務，對香港的戒心亦隨之增加。2003 年 50 萬港人七一遊行，便被視爲外國勢力藉此干預中國事務，中央政府必須高度關注。在此形勢下，除非特區政府能捍衛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無可避免受到威脅。研究發現，中共自 2003 年後對港事務加強干預的結果是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漸失信心和對中央政府的觀感愈來愈差 (Ma 2015)。我們分析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與香港電台每年七一回歸紀念日前所進行的民調可見兩個重要的黃金交叉點。

圖 1 顯示被訪者評估中央政府是否落實一國兩制時，在 2002 年有近六成認爲「有落實」，而只有 14%認爲沒有，認爲「一半半」的亦只有兩成。但自從 2003 年後，認爲「有落實」的百分比一直下降，到了 2015 年跌到 23.5%。而認爲沒有落實的，在 2003 年後有所上升，在董建華下台後曾大幅回落，然後慢慢爬升至 2015 年的 27%。多年來，對一國兩制持正面態度的人都較持負面態度的人爲多，直至梁振英上台後才出現黃金交叉，即持負面態度的人較正面的人爲多。但更多人其實是從正面態度轉向觀望態度，認爲「一半半」的人由 2002 年的 20%增至 2015 年的 46%。

圖 2 顯示香港市民目睹中央政府對港政策轉變後，對中央政府的印象亦同時變壞。2002 年被訪者有近六成對中央政府持正面態度、而只有 4%左右持負面態度，35%是沒有變化，可以說中共在回歸後信守高度自治的承諾，在港人心目中樹立了非常正面的形象。但自從中國對港政策轉變後，市民對中央政府的印象開始變壞，至 2015 年只有兩成對中央政府仍持正面態度，而持負面態度的則上升至 2015 年的 36%，比 2002 年足足翻了四倍！這個黃金交叉同樣出現在梁振英任內，而更多人是從正面轉向負面而非「沒有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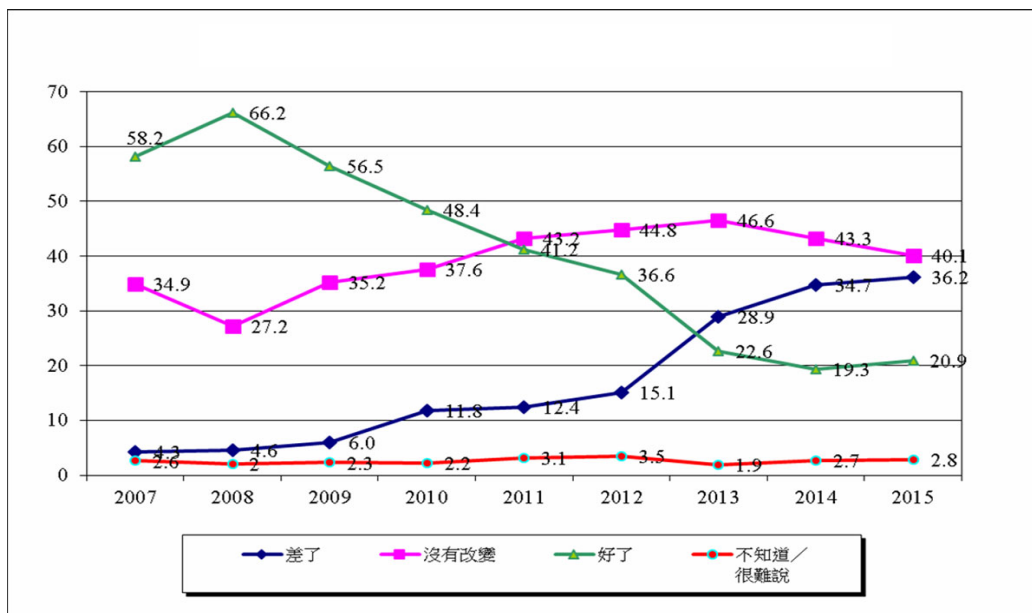
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和中央政府的印象，一方面受到中央政府對港政策影響，另一方面亦與中國大陸的重大事件有關。譬如 2008 年後港人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與當年揭發的「毒奶粉事件」和汶川地震後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有關。而梁振英任內情況所以急劇變化，亦有多種原因。首先，他的支持基礎主要來自傳統愛國力量（如親北京的政黨、工會、社團和紅色商人），又與中聯辦關係特別密切（梁當選後首先拜會中聯辦官員），令人覺得他儼然中共在港的代表，他的表現便直接影響港人對北京的觀感。另一方面，梁振英性格孤僻（競選後未能安撫對手陣營）、好勇鬥狠（動員

圖 1 回歸以來對北京中央政府有否落實「一國兩制」態度的變化 (%)



資料來源：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直接提供。

圖 2 回歸以來對北京中央政府印像的變化 (%)



資料來源：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直接提供。

群眾鬥群眾、鎮壓示威)，令傳統商界精英（如自由黨）、泛民主派政黨（以下簡稱：泛民）^②和公民社會都對他不滿，而中央政府卻一直表示支持梁依法治港，結果令北京的形象被嚴重拖累。

參、和平佔中的抗爭及雨傘運動的內部分歧

由戴耀庭教授、朱耀明牧師及陳健民教授（合稱佔中三子）於 2013 年 3 月開始推動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佔中）運動，可以說是對這種「一國壓倒兩制」的勢頭的反抗。但運動並不排除與中共進行對話談判，只是汲取了 2012 年民主黨及普選聯^③與中共談判造成香港民運的分裂，和平佔中先是組織一連串的「商討日」^④和「民間公投」，希望民衆「授權」泛民與北京對話，而佔領只是最後的手段。因此，許多人都說和平佔中貌似激進，實質溫和，是香港中間力量的最後努力。

在通過商討與公投去草擬政改方案的過程中，就是否必須有「公民提名」一事，民主運動中的激進派與溫和派馬上出現分歧；而就應否提早佔領以製造談判籌碼，亦引起一番爭論。因此，由 2014 年 9 月底開始的學生罷課、「重奪公民廣場」、警方鎮壓、三子宣佈提早佔中、警察施放催淚彈而引發的雨傘運動，是對政府不滿的總爆發，同時間亦暴露出雨傘運動的內部分歧。

雨傘運動呈現三種不同的抗命理念。佔中三子和泛民所代表的是傳統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1.0）—非暴力、有限度違法、避免肢體及語言衝突、主動承受刑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以下簡稱：學聯）^⑤及學民思潮^⑥等學生領袖認為和平靜坐等待拘捕太過被動，提倡主動以身體及路障堵塞警察的調度、短兵相接時高舉雙手避免衝突、不強調承受刑責，是公民抗命 2.0。以熱血公民為首的「勇武派」^⑦認為這是一

註② 泛民主派或民主派（Pan-democracy camp 或 Pro-democratic camp），（以下簡稱：泛民），泛指支持香港全面推行民主與普及選舉的政治人物及組織。詳情參考網路資料〈泛民主派〉（維基百科 2017）

註③ 全稱是終極普選聯盟（Alliance for Universal Suffrage）。於 2010 年 1 月成立，由 13 個香港泛民主派組織組成，主要爭取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令香港邁向普選。普選聯最終提出「超級區議員」方案，令立法會增加 5 席由區議員提名、全港選民投票產生的議席，另再增 5 個分區直選議席。方案最終獲立法會通過。

註④ 和平佔中在 2014 年 5 月 6 日於全港五區舉行「全民政改商討日」，讓香港市民參與討論普選特首的方案。詳情參考網路資料〈全民政改商討日〉（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2017）。

註⑤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簡稱學聯，是香港的大專學生組織。雨傘運動後多間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現時只由香港其中四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嶺南大學學生會、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和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詳情參考網路資料〈關於學聯〉（學聯 2015）。

註⑥ 學民思潮（Scholarism）成立於 2011 年，為香港其中一個最活躍的學生組織，曾成功反對在中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後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由於部份成員希望集中處理教育問題而非包括香港前途等政治問題，學民思潮決定於 2016 年停止運作。詳情參考網路資料〈學民思潮〉（維基百科 2017）。

註⑦ 勇武派反對佔中三子及泛民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策略，主張對政府武力以相應的適當武力自我防衛，在街頭抗爭中積極尋求一切實際而可行的手段，旨在直接施加壓力予政府，並不惜以武力衝擊防線、破壞建築物，強行包圍佔領等方法達成抗爭目的。詳情參考網路資料〈「和理非」vs.「勇武派」：由雨傘革命看香港民主社運路線與衝突〉（輔仁媒體 2014）。

場革命，反對公民抗命的非暴力主張，鼓吹攻擊政府設施和勇武抵抗警察，支持戴面罩避免刑事控告。

三股力量對於運動的目標、手段、組織方式、與政府談判的策略、退場機制等都有不同意見。在佔領發生之前，運動主要由佔中三子領導，就政改問題組織多場商討日和民間公投。由於佔領是由罷課和「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所激發，領導權落入學生手中。佔領初期，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泛民政黨及 NGO 代表雖組成「五方平台」，但學聯既然被邀與政府對話，自然成爲了決策的中心。第一輪談判後，三子認爲如不持續對話便應退場，透過「議員辭職、變相公投」，將運動轉化在社區深耕細作。此議與學生產生分歧，結果分道揚鑣。另一邊廂，勇武派一直被排除在五方平台外，鼓動「拆大台」，反對統一領導。結果學生在勇武派壓力下，不但沒有主動退場，更在民氣消退的時候發動升級行動，造成多人受傷，佔領亦黯然告終。雨傘運動結束後，勇武派認爲和平抗爭已徹底失敗，特別批評 11 月 30 日學聯發動包圍香港政府總部的升級行動缺乏部署，引發不少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比前更爲躁動。

肆、後雨傘運動的社會趨勢

一、本土化

隨著雨傘運動結束，本土思潮迅速冒起。北京既然說《基本法》容不下「真普選」（合符國際標準的普選），年輕人不敢放棄真普選的話，便只有放棄基本法、放棄一國兩制而思考自決和獨立的問題。特別當梁振英點名攻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兩書鼓吹港獨後，市民爭相購閱，洛陽紙貴，本土思想已成爲新一代反叛的武器。

過去十年，自由行帶來暴發戶橫行、以我爲主的對港政策令中聯辦官員傲慢離地，港人生活和自治空間不斷受到擠壓。市民的普選訴求被一拖再拖，北京成爲香港走向「善治」的最大障礙。雨傘運動的爆發，標誌著「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抗命不認命」的精神是擺脫既定的框架，尋求命運自主。既然北京以「愛國」和「國家安全」作爲賦予港人政治權利的前提，被挫敗的雨傘新生代對專制中國最徹底的回擊，是挑戰國族身份這個最神性的圖騰。雨傘運動後本土派乘勢崛起，但內部差異甚大，不能一概而論。筆者姑且將其論述分爲三種：

（一）本土優先論

與文化層面的本土意識不同，提出本土／港人優先論者，要求在社會政策上區別永久居民與新移民的權利、減少大陸來港移民、港府擁有移民審批權等，對國族身份

問題未有正面觸及。新民主同盟^⑧較早提出這種主張。

（二）城邦自治論

主張與中國大陸徹底區隔，以防大陸腐朽的制度和文化的滲入香港。香港要自保，必須「井水不犯河水」，不沾手大陸政治，反對參與「建設民主中國」，認為民主化後的中國將放棄一國兩制，不利城邦自治。城邦論並無否定「一國」，甚至認為香港是保存華夏文化正統的希望，其願景為「邦聯制」。陳雲（2011）及香港復興會^⑨是這種主張的倡導者。

（三）港獨民族論

本土意識最極致的訴求是「港獨」，但往往被譏為不切實際，分化社會。較完整港獨綱領，是先為港獨做好文化與社會準備，伺機而動（如等待中國崩潰），再爭取獨立。如果國族（nation-state）是包括疆土、民族和行使主權的政府，港獨的「準備工作」便是建立一個沒有主權國家地位的香港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梁繼平 2015）。正如 Benedict Anderson（1991）的理論，本土語言、文化傳說、生活方式、區域自治都是建構民族認同的元素，就如魁北克人、蘇格蘭人、加泰隆尼亞人等，都是先建立起民族意識再爭取獨立。港大《學苑》、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都是支持港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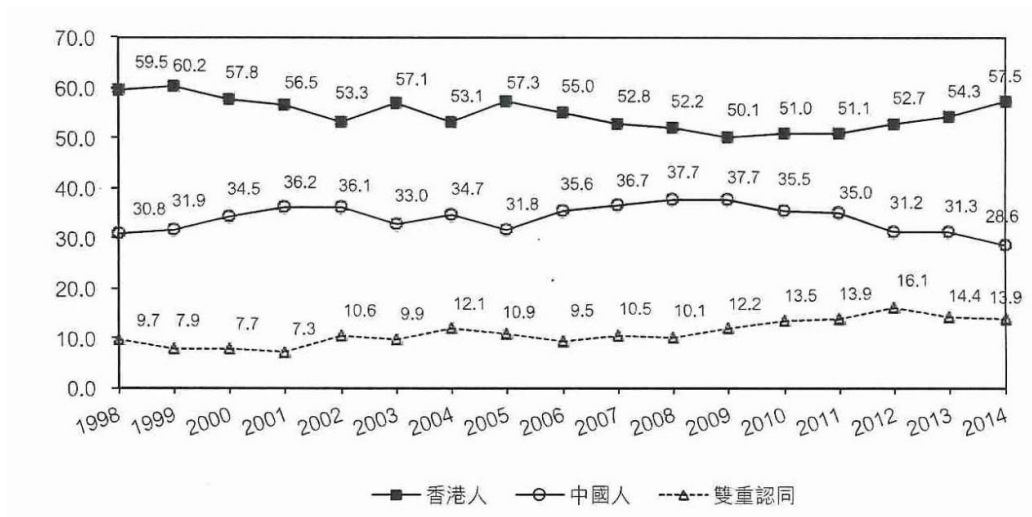
上述三種有清晰政治意涵的本土理念並非橫空出世。多年以來，偏安南隅的香港與北方中原文化一直保持隔離，再加上 150 多年的殖民地歷史，已發展出一種獨有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尹寶珊、鄭宏泰（2016）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香港人自回歸以後近六成人視自己為「香港人」、約三成為「中國人」、一成左右是「雙重認同」（既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百分比多年來變化不大，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卻在 2008 年的高點（37.7%）下降至 2014 年的 28.6%，當中不少轉為「雙重認同」，令其從 1998 年的 9.7% 上升至 2014 年的 13.9%。

但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青年（18-30 歲）的身份認同自 2012 年梁振英上台後變化非常巨大。2011 年，只有 58.2% 青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2014 年已攀升至 75.8%，與中年／長者有明顯的差異。（見圖 5）而中國人認同則從 2008 年的 37.6% 高位下滑至 2014 年的 16.3%，同樣與中年／長者有明顯的差異。（見圖 6）以 2014 年來說，青年人認同自己為香港人（75.8%）比起認同為中國人（16.3%）足足多了四倍多，而中年／長者的香港（53.7%）和中國認同（31.6%）卻只差 22%！

註⑧ 新民主同盟（英語：Neo Democrats，以下簡稱：新同盟）成立於 2010 年，是一個香港溫和本土泛民主派政黨及地區政團，乃由前民主黨成員為主所組成之政黨。政黨強調務實本土路線，從實際政策倡議，去捍衛香港本土權益。詳情參考網路資料〈新民主同盟〉（維基百科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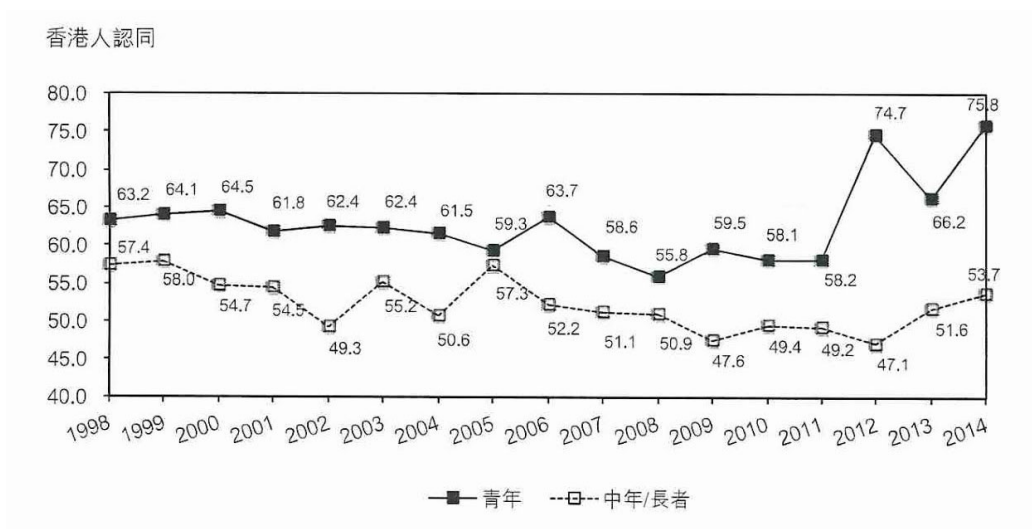
註⑨ 香港復興會（Hong Kong Resurgence）乃 2014 年成立的香港本土組織，主張香港城邦自治、「永續基本法」、建立「華夏邦聯」及復興華夏文明，提倡者為香港學者陳雲。詳情參考網路資料〈香港復興會〉（維基百科 2017）。

圖 4 香港人和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轉變，1998~20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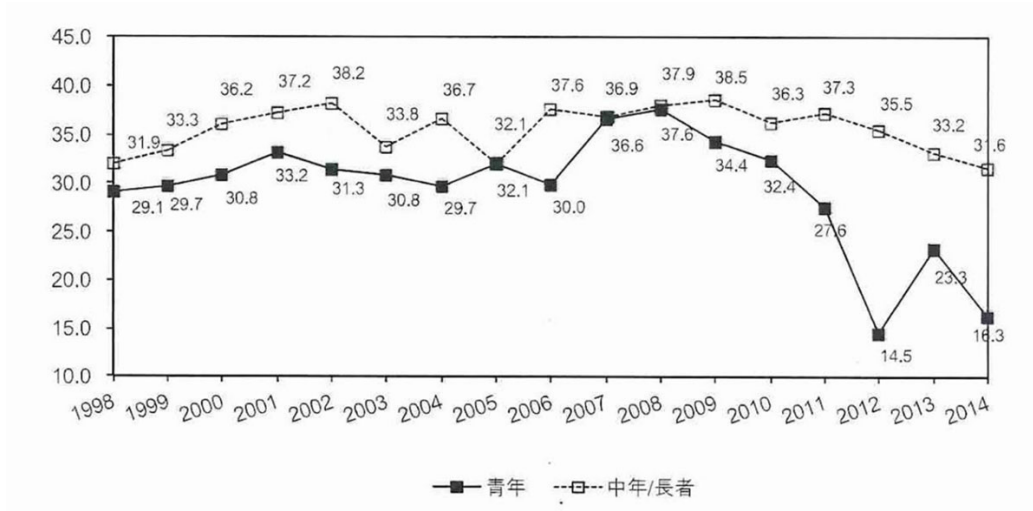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尹寶珊、鄭宏泰 (2016)。

圖 5 青年身分認同的轉變，1998~20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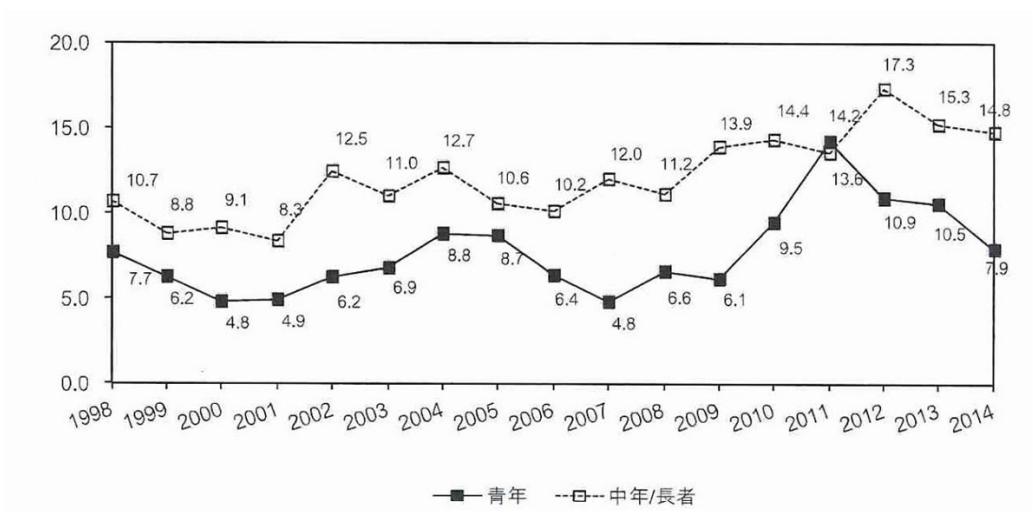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尹寶珊、鄭宏泰 (2016)。

圖 6 中國人認同



資料來源：尹寶珊、鄭宏泰（2016）。

圖 7 雙重認同



資料來源：尹寶珊、鄭宏泰（2016）。

這些數據顯示香港新一代逐漸形成「天然本土」的趨勢，而且與中國認同出現抵觸。在雨傘運動以後，不單在世界杯外圍賽中，香港隊不惜阻截中國隊出線，更有球迷嘯國歌和打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在示威遊行中，本土青年亦會打出「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的橫額。即使香港獨立的機會十分渺茫，本土認同已成為新世代的標誌，是一種身分政治。

這種本土認同連帶令贊成台獨的比例亦大幅上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現，雖然反對台獨的港人仍佔多數，比例為 52%，不過贊成台獨的比例，就由 2015 年的 29% 升至 2016 年的 35%，是逾 20 年以來的新高。此外，47% 受訪者贊成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30% 受訪者反對。有 33% 受訪者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52% 人認為不適用。被問到兩岸統一的信心，只有 28% 回應正面，56% 對此態度負面。研究亦發現，市民年紀愈輕，愈贊成台灣獨立，對兩岸統一亦愈無信心。其中 18 至 29 歲的受訪者，有 67% 支持台獨；50 歲或以上的人，贊成比例就低至 21%（立場新聞 2016）。

二、激進化

由於雨傘運動並非以悲劇結束，激進化趨勢並無在佔領後馬上發生；直至 2016 年 2 月農曆年初一晚上的「旺角騷亂」，勇武派才真正出場。這場警民衝突是源於警方驅散無牌熟食小販而引發。首先在大除夕晚，來自傳統社運陣營（被本土派稱為「左膠」）的劉小麗老師因支持小販被捕，然後她號召市民年初一晚到旺角支持小販夜市文化。同一時間，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亦號召民衆到旺角支援小販。該組織曾以「光復行動」驅趕「水貨客」和自由行旅客，由於手法粗暴而引起爭議，但最後中國大陸政府中央政府加強限制自由行（由「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他們覺得勇武策略有效。本民前認為小販是本土文化，早在 2015 年已作出支持，這次因為有派代表參選 2016 年 2 月底的立法會補選，想在支援小販的同時在旺角舉行競選遊行。結果警察進行驅散引起嚴重衝突，有警員向天開槍示警，示威者以磚頭還擊，直至黎明。

究竟誰是勇武派？據報這次有近 700 人參與旺角騷亂，警方至今拘捕 75 人（66 男 9 女），以及 3 名「在互聯網鼓吹他人作犯罪行為者」。警另拘捕 4 名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不排除」與騷亂有關者，身分為環保人士，現保釋候查（最後查實與案無關）。在 44 名有姓名、年齡及職業的被捕者中，平均年齡為 27 歲。其中 8 人（18%）為學生、14 人（32%）為無業，7 人（16%）廚師或侍應、6 人（14%）為工人，其餘 9 人（20%）是售貨員或其他文職人士。其中本民前的梁天琦及黃台仰、熱血公民一位成員在被捕者之列。

以被捕的背景來看，除了學生之外，主要是無業或低層工作的青年，這與 2012 年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與香港電台的一項回歸周年民意調查的部分結果非常吻合。該項調查有問到被訪者是否接受用激進手段來表達訴求時，發覺有近半香港人並不接受，而接受的只有兩成多。但青年被訪者（18-29 歲）看法剛剛相反，接受的有 43%，不接受的只有 24%。而從教育水平看，大學或以上的被訪者有 36% 接受，比中學教育（29%）和小學或以下的（13.3%）為高。可見高教育的青年最為激進。

此外，月入 HK\$10,000 至 HK\$40,000 的被訪者是最支持激進行動。中上階層（月入 HK\$40,000 或以上）是最保守的。在中下層被訪者中，32.7% 接受激進行動，比起工人階級（24.7%）和中上收入階層被訪者（25%）為高。綜合來說，大學生和中下收入青年僱員是最接受激進行動的人士。前者主要是意識型態的衝突，後者則涉及香港

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和新自由主義下青年缺乏職業前景所至。

表 1 你是否接受以激進行動表達訴求？

	接受 (%)	一半半 (%)	不接受 (%)
教育水平			
小學或以下	65.3	21.4	13.3
中學	46.5	24.7	28.8
大學或以上	38.0	25.8	36.3
年齡 (歲)			
18-29	24.3	32.6	43.1
30-49	45.4	25.1	29.6
50或以上	53.8	20.8	25.3

資料來源：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直接提供。

令人詫異的，是香港這個素來溫和的社會對這場騷亂表現出驚人的承受力。根據「新思維」(新成立的溫和政黨)於騷亂後(2016/2/14)發表的「旺角警民衝突」電話民意調查結果，有 87%不贊成採用暴力手段；其中雖有 45%加以譴責，卻有 42%表示「體諒但不贊成」。另外，認為警方處理「恰當」的有超過 30%，但有逾 40%受訪者認為警方處理手法「過份暴力」(星島日報 2016)。本民前立會補選候選人梁天琦更於騷亂後人氣急升，即使政府指控其競選宣傳物品涉及港獨主張而拒絕為他提供免費郵遞，最終仍以高票落選(66,000 票，即 15%)，梁並揚言建制、泛民、本土已成鼎足三立之局。

三、犬儒化

所謂犬儒化(cynicism)，是指對他人或社會失去信心，感到無力改變現狀，甚至認為這種努力是毫無意義的。面對政府空轉、深層次問題無法疏解、政制爭拗不斷、社會嚴重撕裂，中產階級有可能變得犬儒化。由於雨傘運動並未能帶來制度的轉變，連「梁振英下台」的訴求都無法實現，在許多運動領袖相繼表示沮喪失望的時候，社會會否普遍出現犬儒化值得關注。

犬儒化的其中一個後果是移民潮的出現。香港在 1989 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和 97 前途問題造成 1990 年代初數以十萬計港人(特別是中產專業人士)移民美加等地。但由於中國在香港回歸後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尊重特區高度自治，移民潮已不復再。但根據《星島日報》2015 年的一項報導，港人自 2007 年對香港發展前景愈來愈悲觀，希望移民外國的受訪者百分比亦從 2007 年的 30%上升到 2014 年的 62%。

圖 8 對社會前景的樂觀感下降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2015）。

從保安局發表的港人移民外國數字，從 2009 年至 2013 年中，除了加拿大以外，並未有明顯增加。但據報移民台灣的數目在 2015 年有大幅增長，而更令人憂慮的是根據香港警方的統計，2014 年申請「良民證」（無犯罪記錄證明書）達二萬一千多宗，較 2013 年增逾兩倍，創十年新高。由於良民證是申請移民時的必備文件，這顯示有相當多港人正在規劃移民當中，隱而未發。梁振英會否連任和會否出現更多暴力衝突事件將是關鍵。

和這種犬儒化背道而馳的是佔領運動後出現大量的傘後組織和青年參政潮。最為突出的是在不同領域的青年專業人仕組成了十多個團體，運用其專業知識爭取民主和社會公義，他們包括：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精算思政、前線科技人員、思言財雋、進步會師、思政築覺、良心理政、放射良心、量心思政、藝界起動、保險起動、規言劃政、園境願景、護士政改關注組。他們與佔領前已成立的進步教師同盟和社工復興運動經常舉辦聯合抗議行動及進行社區教育。

此外，在 2015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前，不少青年「傘兵」組成了參政團體和地方關注組織（如青年新政、灣仔好日誌、灣仔廣義、東九龍關注組、西環飛躍動力等），參與選舉。即使準備倉促，最後有八位傘兵當選，其餘亦多以高票落選。雖然資源充裕的建制派在區選中佔有優勢，結果議席數目不進反退，令梁振英「用選票將民主派

趕出議會」的希望落空 (Cheng and Chan 2016)。

2016 年 9 月立法會舉行大選，非建制陣營出現多個參選聯盟：港獨城邦 (熱血公民 + 普羅政治學院 + 香港復興會)、本土青年的選舉聯盟 (青年新政 + 傘後組織)、雙學及社運聯盟 (香港眾志 + 民主自決派) 等，再加上原有的泛民政黨，民主派湧現的是世代交替和路線之爭，競爭異常激烈。結果民主派不單在地區直選上大勝，亦在功能團體議席成功搶灘。而在 2016 年 12 月舉行的特首選委會選舉中，民主派在專業界大獲全勝，令其在 1200 人的選委會中佔據最少 325 個席位，舉足輕重，振奮人心，緩和了犬儒的情緒。

伍、結 論

本文指出，本土主義和武勇抗爭的主張能夠在短時間內崛起，與雨傘運動有直接關係。青年世代覺得一場氣勢磅礴的非暴力公民抗命竟「無功而還」，不得不思考新的運動方向。如果人大 831^⑩決定意味著在一國兩制下不能有真普選，年輕世代不會放棄真普選，卻不惜放棄一國兩制，探討自決甚至獨立的可能性。如果和平抗爭不能達到目的，部分年輕人覺得有考慮勇武手段的必要。

經過雨傘運動，本土主義已成為世代的標記，是一種身分政治。即使在現實上香港獨立或就 2047 年 (五十年不變的終結) 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的可能性極微，推動獨立／自決運動是表達一種叛逆精神，通過冒犯中共的禁忌，有效地整合新生政治力量。由於傳統泛民政黨和社運主流被本土派視為「民主回歸論」(支持回歸實現民主港人治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左翼思潮」(以階級矛盾而非中港矛盾為主軸) 的代表，部份本土派認為泛民亦是其對手。

許多親政府的評論都認為激進勢力的興起是源於樓價高企和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從本文的數據分析所見，不少激進青年的確來自中下階層，他們在「新自由主義」下職業橫向流動 (轉工) 卻缺乏縱向發展，生活壓力甚大。但另一個支持激進行動的群體是青年學生，他們的不滿更多是源於世代價值觀的衝突。大學生對上一代將香港視為純粹的經濟社會不以為然，更討厭他們在政治上的妥協與犬儒。通過近年的公民教育，青年對於保育、平等、參與、分享的理念特別推崇，對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分外反感。因此，激進主義的興起不能單歸咎經濟或政治因素。

從圖 1 及 2 所見，2003 年起中港衝突主要激發點是政治與文化，與經濟的起跌關係較少，更多是中國國家主義日益擴張，造成與香港自由主義的直接碰撞。(當然，中

註⑩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北京舉行會議，其中一項議程審議香港政改報告，簡稱為「831」決定。明確規定提名委員會人數須按照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維持 1200 人組成，提名門檻是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特首候選人數目定於二至三人，如特首普選未獲法定程序通過，2017 年特首選舉將會繼續沿用 2012 年特首選舉的產生辦法。此決定被香港民主派批評為有篩選的普選，並非真普選。詳情參考網路資料〈背景資料：香港普選政改大事件〉(BBC 2015)

資在港影響力日增，傳媒及企業爲了拓展中國市場而自我約束，經濟其實間接地影響政治) 如果梁振英在 2017 年連任，標誌著中國繼續採取強硬對港政策，青年人將更走向本土與激進化，中產階級走向犬儒化，中港關係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在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中，梁振英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即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前兩天，宣布不再競逐連任。一般相信是北京勸退梁振英，以避免民主派在選舉中得利。究竟北京只是換人或是換路線，將對一國兩制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港人引頸以待 2017 年 3 月的特首選舉。

* * *

(收件：105 年 7 月 20 日，接受：106 年 1 月 17 日)

Localism, Radicalism and Cynicism in Post-Umbrella Movement Hong Kong

Kin-Man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G Vitrierat

Teaching Fellow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Occupy Central (Umbrella Movement) that broke out on September 28, 2014 involved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fight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rough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in Hong Kong. The movement lasted 79 days with no substantial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demand for political reform. The movement was then split by different ideas regarding goals, strategi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negotia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timing for retreat. Eventually, the student leaders under apparent pressure from the more radical forces, decided to escalate the movement by storming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 The action was not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and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casualties, which triggered the clearance of the occupation by the government. Even though the movement had enlightened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many of whom regarded it as a complete failure. The post-Umbrella Hong Kong was very depressed and people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three social trend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sm” has spread ideas such as “Hong Kong people come first”, “self-governing city-state” and “Hong Kong nation” or even “Hong Kong independence”. Many youngsters believ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cannot accommodate democracy and thus

necessitate a f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 or even 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Second, radicalism spurs in many who believe that the non-violent strategy of the old democracy movement is proven too weak when confront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of China, and advocate a more militant tactic such as the 2016 Chinese New Year riot dubbed by the media as the “Fishball Revolution”. Third, cynicism,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prevails among the middle class. H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 future? What will these three trends lead to? The answers depend very much on whether Beijing will continue its “interventionist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since 2003.

Keywords: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Localism

參考文獻

- BBC 中文網，2015，〈背景資料：香港普選政改大事件〉，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4/150415_hk_political_reform_background，查閱時間：2017/2/13。
- “Beijing ziliao: xianggang puxuan zhenggai da shijia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hronology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基本法與你息息相關〉，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chapter_2.html，查閱時間：2017/2/13。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Jibenfa yuni xixi xiangguan” [The Basic Law Concerns us all. Let’s get involved.].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尹寶珊、鄭宏泰，2016，〈身份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趙永佳、葉仲茵、李鏗主編，〈躁動青春〉：129-144，香港：中華書局。Yin, Pao-shan and Hong-tai Zheng. 2016. “Shenfen rentong: dui zhongguo de‘zhongxin xiangxiang’” [Identity: Re-imagining China]. In “Zaodong qingchu” [Turbulent Youth], eds. Yong-jia Zhao, Chung-Yin yeh and Keng Li. Hong Kong: Chung Wa Book co.
- 立場新聞，2016，〈旺角騷亂被捕者名單〉，<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7%BA%E8%A7%92%E9%A8%B7%E4%BA%82%E8%A2%AB%E5%91%8A%E5%90%8D%E5%96%AE/>，查閱時間：2017/1/5。Stand News. 2016. “Wangjiao saoluan beibuzhe mingdan” [The List of Arrested Persons in Mongkok Riot]. (Accessed on Jan 05, 2017).
- 星島日報，2015，〈探討港人移民潮再現狀況〉，http://stedu.stheadline.com/sec/sec_news.php?aid=1628&cat=8&subcat=22，查閱時間：2017年1月5日。Sing Tao Daily. 2015. “Tantao gangren yiminchao zaixian zhuangkuang” [The Study of New Wave of Emigration in Hong Kong]. (Accessed on Jan 05, 2017).
- 星島日報，2016，〈「新思維」民調倡尋解決方法近九成受訪市民反對旺角暴力行爲〉，<https://hk.news.yahoo.com/%E6%96%B0%E6%80%9D%E7%B6%AD-%E6%B0%91%E8%AA%BF-%E5%80%A1%E5%B0%8B%E8%A7%A3%E6%B1%BA%E6%96%B9%E6%B3%95-%E8%BF%91%E4%B9%9D%E6%88%90%E5%8F%97%E8%A8%AA%E5%B8%82%E6%B0%91-%E5%8F%8D%E5%B0%8D%E6%97%BA%E8%A7%92%E6%9A%B4%E5%8A%9B%E8%A1%8C%E7%82%BA-215523079.html>，查閱時間：2017/1/5。Sing Tao Daily. 2016. “Xinsiwei mindiao changxun jie jue fangfa jin jiucheng shoufang shimin fandui wangjiao baoli xingwei” [Survey by Third Side urges finding solutions: around 90% respondents against violence in Mongkok]. (Accessed on Jan 05, 2017).
- 梁繼平，2015，〈綜援撤退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學苑主編，〈香港民族論〉：23-32，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Leung, Brian. 2015. “Zongyuan chetui zhengyi yu bentu zhengzhi gongtongti” [Controversy over withdrawing comprehensive assistant

- scheme and the community of localism”]. In “*Xianggang minzulun*” [*Hong Kong Nationalism*], ed. Undergra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Chen, Yun. 2011. *Xianggang chengbanglun* [*City-stat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nrich Publishing Ltd.
- 維基百科，2017，〈泛民主派〉，<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泛民主派>，查閱時間：2017/2/13。Wikipedia. 2017. “Fanminzhu pai” [Pan-democracy Camp].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維基百科，2017，〈香港復興會〉，<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香港復興會>，查閱時間：2017/2/13。Wikipedia. 2017. “Xianggang fuxinghui ” [Hong Kong Resurgence].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維基百科，2017，〈新民主同盟〉，<https://zh.m.wikipedia.org/zh-hk/新民主同盟>，查閱時間：2017/2/13。Wikipedia. 2017. “Xinminzhu tongmeng” [Neo Democrats].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維基百科，2017，〈學民思潮〉，<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學民思潮>，查閱時間：2017/2/13。Wikipedia. 2017. “Xuemin sichao” [Scholarism].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輔仁媒體，2014，〈「和理非非」vs.「勇武派」：由雨傘革命看香港民主社運路線與衝突〉，<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12/17/93649/>，查閱時間：2017/2/13。VJ Media. 2014. “‘Heli feifei’ vs. ‘yongwupai’: you yusan geming kan xianggang minzhu sheyun luxian yu chongtu” [Peaceful, rational, non-violent and non-foul-language action VS militant action: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streams of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學聯，2015，〈關於學聯〉，<https://www.hkfs.org.hk>，查閱時間：2017/2/13。HKFS.2015. “Guanyu xuelian” [About HKFS].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2017，〈全民政改商討日〉，http://oclp.hk/index.php?route=occupy/activity_detail&activity_id=53，查閱時間：2017/2/13。Dai, Yao-ting, Kin-Man Chan and Yao-ming Zhu. “Quanmin zhenggai shangtaori” [Deliberation day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7).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Cheng, Edmund W. and Wai-yin Chan. 2016. “Explaining spontaneous occupation: antecedents, contingencies and spa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 (1): 1-8.
- Ma, Ngok. 2015. “The rise of anti-China sentim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2012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China Review* 15 (1): 39-66.
- Sapio, F. 2015. “Carl Schmitt in China, The China Story Journal, 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2015/10/carl-schmitt-in-china/>. (November 5, 2015).